

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

蔣 永 敬

幼年受文學與史學的薰陶
北大學生，五四運動的主角
留學歐美，提出近代史研究計劃
參加北伐，嚇不走的革命黨人
主持清華，學術獨立
武大教授，提出研究近代史的方法
主持政校教育，以革新政治為雪恥圖強基礎
主持中大，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由考察西北到出使印度，致力邊疆事務
主持黨史會與國史館，整理近代史料
留下的著作，有待搜集與保存

羅家倫志希先生（1896～1969）是五四運動的主角之一，「五四運動」一名詞即由其最先創用。留學歐洲時，又首倡有計劃的研究中國近代史。其後參加北伐戰役，出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於促進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極有貢獻。抗戰期間考察西北及戰後出使印度，致力邊疆事務。晚年主持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及國史館，於近代史料的整理，多所注意。

幼年受文學與史學的薰陶

羅先生的幼年在其嚴父慈母的教養下，即受到文學與史學的薰陶。據羅先生在其「蓼莪集」自述：

「三歲時吾母置我於膝上，教以識字並背誦短詩；入家塾後，晚間輒於素油燈前為我溫課。……吾父鈍庵公有時督責稍嚴，母則濟之以寬；余因頑劣受侮時，母常戒之以格言，感之以溫淚。晨起猶未早餐，必盤旋父榻之前，或跪

榻几，或坐小檯上，以聽父講授歷史中先民之故事。凡此典故，均由吾父加以選擇，認為有興趣而且富於教育意義者，先於夜間錄入小冊；講授完畢，即以此小冊付余複習；日恒二三則，如是者數年。當時風氣初開，凡滬上有關新知之課本或書報，父常儘先託友人購寄，供余參閱。……母逝後，父憐我失恃，待我如嚴師，亦如慈母。然余已漸大，就外傅之日多，惟晚間仍得聆吾父之教誨。」^①

羅先生的父親名傅珍，字沛卿，又字鈍庵，原籍浙江紹興。清末在江西任官，勤政愛民，工書畫，並著有「齋菜根齋」詩文、詩話、聯語多種。彼雖為清吏，極同情革命，曾力勸當時江西巡撫馮汝駿寬宥革命黨人，於是新軍中因案得脫者多，李烈鈞即其中之一人。母周氏，名霞裳，字瓊仙，亦具文采。羅先生出生於江西，正其父遊宦江西之時。九歲喪母，父即兼母職，復親授以「王陽明集」及「劉宗周人譜」。對其進益，曾記以詩云：「鄉賢歷歷頻頻數，惟讚王劉不朽文」。鄒容之「革命軍」為當時之禁書，其父袖歸一冊，命羅先生細讀，更激發他的趨新熱情，詩謂「大袖藏歸革命軍，教兒讀罷氣如雲」。^②

清末民初，羅先生偕家人寄居南昌。民元年，李烈鈞督贛，曾訪羅先生的父親，謝其當年救脫之恩。^③這時羅先生就讀於美教士高福綏(F. G. Gale)的英文夜校，因為和上海一帶出版的書報接觸較多，而且喜歡從招生廣告中函索上海若干有名學校的章程，於是心焉嚮往；不但自己想去投考，並且鼓勵同輩的少年朋友也去，以壯聲勢。^④

民國三年，羅先生到上海就讀復旦公學。^⑤此校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創辦人為馬相伯、于右任、葉仲裕等氏。在此之前，上海震旦學院學生發生退學之事，在馬之領導勉力下，決定籌組一相等的學校。在開學之前，由於震旦退學同學回想退學時的痛苦，大家集議為學校命名，于右任建議「復旦」二字，表示不忘震旦之

① 羅家倫「心影遊蹤集」上册頁48~49(線裝本，民國四十六年臺北華國出版社)。

② 同上，頁51~52。

③ 同上，頁52。

④ 羅家倫「懷念尹仲容先生」，見「逝者如斯集」頁202~203(民五十年傳記文學出版社)。

⑤ 夏文俊「羅家倫先生年譜簡編初稿」(新知雜誌第三年第二期)。

舊；更容復興中華的意義。當時學校編制，倣照前清高等學堂規則，定名為復旦公學。設文理二科。初期學生一百餘人。由於復旦創辦人中有革命黨人，所以復旦和國民黨有着密切的關係。民國二年復旦校董改組時，孫中山先生且被推為校董會主席。當時復旦且有另一特點，就是言論自由的精神。因此復旦學生的政治興趣比其他學校來得濃厚。^⑥在這一環境之下，羅先生對於新知識的領域更加擴大。民國五年，黃克強先生在上海，羅先生也曾和他會見過兩面。^⑦這時他在復旦已很活躍了。他是復旦雜誌的編輯。^⑧曾撰「二十世紀中國之新學生」刊於復旦雜誌（第三、四期），上海報紙且有轉載。^⑨有時為報紙寫寫文章，與戴季陶（傳賢）也時有簡短的晤談。^⑩

北大學生，五四運動的主角

民國六年夏，北京大學在上海招考新生，羅先生報名應試被錄取。秋間北上入京，肄業文科，主修外國文學。北大原是一個陳舊的學校，自民國五年底蔡元培先生長校後，以其人格的影響，學風為之丕變；他更以廣大的態度，集合了當代許多學者，在那裏研究討論哲學、文學、人生，以及各種社會問題。^⑪使羅先生深受影響的，而是北大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到民國七、八年間而更甚。如羅先生所述：「我尤其身受這種好處。即教授之中，如胡適之先生就屢次在公開演講中，盛稱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諸位先生（當時的學生）相互討論之益。」^⑫其時羅與傅斯年、毛子水、顧頡剛、段錫朋諸氏，均為北大傑出的學生，傅與羅尤稱友好。如羅先生自述：「當年孟真（傅斯年字）不免有一點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時彼此間不免因爭辯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見面不講話，可是氣稍微下去一點立刻就好了，因為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認識，

⑥ 李雲漢「于右任的一生」頁30~31（民國六十二年臺北新聞記者公會出版）。

⑦ 羅家倫「從墨蹟中體認到的黃克強先生」，見「逝者如斯集」頁127。

⑧ 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見「逝者如斯集」頁144。

⑨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三）頁189（民國六十年傳記文學出版社）。

⑩ 同註⑧。

⑪ 羅家倫「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見「逝者如斯集」頁2。

⑫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見「逝者如斯集」頁64。

以後成爲彼此人格間的信任。」^⑭ 傅的記述亦曾指出：「志希和我，因爲彼此都有好吵鬧的脾氣，幾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於氣忿忿的不談話了。然而過五六分鐘，仍然一切如常。任憑吵上多少次，我們總是最好不過的朋友。」^⑮ 他們兩人之間開始有較深的了解，是在胡適之先生的家裏，那是胡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後，兩人常到胡家，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爲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他們爭論的問題，不外是「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⑯

民國七年秋，羅先生和傅斯年、顧頤剛、康白情氏爲了文學革命，進而爲新文化運動呼號，開始籌辦「新潮」月刊。這年十月十三日開第一次預備會，決定此刊的三種「原素」，即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新潮」這一中文名稱的產生，即是根據羅先生的提議，而與另一提議用 The Renaissance 英文名稱恰可互譯。十一月十九日，開第二次會議，選出職員，主任編輯爲傅斯年，羅爲編輯。這時只有會員二十一人。^⑰ 民國八年元旦，「新潮」第一號出世，其中有傅的文字十篇。羅的文字三篇：「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國之小說界」及「今日中國之新聞界」，所論均爲現實問題。^⑱ 此爲繼「新青年」而起鼓吹文學革命之第二個刊物。

關於創辦「新潮」的動機和經過，以及所生的影響，羅先生有如下之自述：

「民國七年，孟眞和我還有好幾位同學，抱着一股熱忱，要爲文學革命而奮鬥。於是繼新青年而起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這是在這個時代中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行澈底的以近代人的語言，來表達近代人的意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不登載文言文。我們主張文學主要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應當着重從這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

^⑭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眞」，見「逝者如斯集」頁171。

^⑮ 「民國百人傳」（三）頁198。

^⑯ 同註^⑮，頁166；頁168。

^⑰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發展」（明報月刊七十一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香港）。二十一名會員名單，據「周文」列名如下：傅斯年、羅家倫、顧頤剛、康白情、毛準（子水）、江紹原（源）、汪敬熙、吳康、何思源、李榮第（小峯）、俞平伯、郭希汾（紹虞）、孫福源（伏園）、孫福熙（春台）、張崧年（申府）、譚鳴謙（平山）、高尙德（君宇）、楊振聲（金甫）、劉秉麟（南陔）、孟壽林、馮友蘭、朱自清、高元（承元）、潘家洵（介泉）。

^⑱ 「民國百人傳」（三）頁198。

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方面，而對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新潮的政治采色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重定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固有的文化，分別的重新估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到了民國八年上半年，文學革命運動已經擴大為新文化運動。等到五四運動的巨浪發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這股偉大的思潮，在許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紀後期由法國開始，以後瀰漫到全歐的啓明運動。」^⑱

由於新潮不但激烈的主張新文化運動，而且堅決的主張反軍閥、反侵略，因此新潮社的人員便與五四運動的發生，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而羅先生在這一運動中，亦可說是居於推動的重要角色。如同羅先生本人所述：「民國七年，爲了反對媚日外交，出賣高徐、濟順兩條鐵路的事件，北大學生在西齋飯廳開會，並歡迎回國學生報告日本侵略我國企圖。我是最後演說的一個人，因情緒過於激昂，竟提議發起第二天北大全體學生赴新華門請願和抗議運動，這是五四運動的前奏，當時弄到蔡先生一度辭職，我頗受一部分愛護學校的同學的責難。」^⑲

當民國八年四月底，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學生的組織包括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工學會、同言社，和共學會都紛紛召開會議，決定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最後通牒的四週年紀念那天，舉行民衆示威大會。但這次會議以後，五月一日至三日由巴黎傳來的消息更加使人震驚，北京民衆的情緒達到激昂的熱度，政治團體和社會團體都在五月三日急忙的召開緊急會議，企圖盡力設法解救這個難關。^⑳ 這天最活躍的一羣學生鑒於情狀緊急，便於當晚七時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緊急會議，參加的學生有一千多人。會議通過了好

^⑱ 同註^⑱，頁169~170。

^⑲ 羅家倫「書論天下才我爲蒼生哭」，見「逝者如斯集」頁154。

^⑳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發展」（明報月刊七七號）。

幾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決定提前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中午十二時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專學生舉行羣衆大會，遊街示威，抗議當局的外交政策。^①當即推定代表二十人，分別前往北京各大學聯絡。羅及傅斯年、段錫朋等均爲代表。^②傅與羅先生均爲新潮社的負責人，段爲國民雜誌社的負責人之一。事實上，五四前夕的集會，主要是由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裏的人主持。當時大家的情緒雖很激動，但會議却進行得很有秩序，他們多數人從開始就不贊成暴動行爲。因此五月四日的整個遊行示威都似乎經過細心的準備。^③

五月四日是星期日，北京各大專學生代表依照先一天晚上會議的決定，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預備遊行示威的活動。下午一時半左右，各學校學生三千多人齊集天安門廣場。教育部代表及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均來勸阻遊行，無效。遂即按照預定路線出發遊行。在遊行中，羅先生被推爲三人代表之一，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歷訪美英法義各國公使館。因星期天，各國公使均不在館，即由館員代見。由代表們面交書面意見。^④

在五四集會和隨後的遊行示威中，分發印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說明了這次遊行示威的目的。這一傳單，即由羅先生起草。內容如下：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的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請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① 同上，（明報月刊七八號）。

② 「民國百人傳」（三）頁199。

③ 同註①。

④ 「民國百人傳」（三）頁199。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²⁵

這篇宣言用了生動、簡潔的白話文，反映了文學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認為它是青年知識份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²⁶但更為重要的是羅先生用「毅」的筆名於這年五月二十六日刊行的「每週評論」（第二十三期）上發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這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最早的創始。此文首先提出「什麼叫做五四運動」，然後指出這次運動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即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裁制的精神；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此一見解，如同胡適之先生後來所指稱：「這篇文章發表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效果之前，這裏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²⁷

五四時期，羅先生不過是一位二十三歲的青年，而能具有如此新的觀念，顯然是由於他吸收了較多的西方思想，讀了更多的西方文學——易卜生、托爾斯泰、莫泊桑、克魯泡特金，和蕭伯納。²⁸正如羅先生的回憶：「我們在辦新潮以前和在辦新潮的時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國書。」²⁹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五四以後，羅先生和他的一般朋友們如傅斯年、段錫朋等，雖然已享有一些名氣，且遇着過一些政治社會的引誘，可是他們絕不為動，相約繼續求學，以充實自己，再圖報國。³⁰因撰有「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一文刊載新潮（民國九年五月，第二卷第十期），旋經上海「申報」轉載全文。此文不僅對過去作了切實的檢討，並且對未來還主張大家要認定方向，分作兩大方面去努力：（一）

²⁵ 同註²¹。據羅先生追憶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點鐘，我方從城外高等師範學校回到漢花園北京大學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北大起稿，北大同學命我執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着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萬張；結果到下午一時，祇印成二萬張分散。此文雖然由我執筆，但是寫時所凝結的却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後來羅先生告知研究五四運動的周策縱云：他起草這篇宣言時，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雖然社裏的人來來往往，很是嘈雜，他却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後也沒修改過。

²⁶ 同上。

²⁷ 胡適「紀念五四」（獨立評論第一四九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北平出版）。「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八冊轉錄。

²⁸ 周策縱前文（明報月刊七七號）。

²⁹ 「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見「逝者如斯集」頁171。

³⁰ 「書詒天下才我爲蒼生哭」，見同上，頁156。

積極的研究學術，為新文化運動放一個建設性的異彩；(二)深入民衆，為實際解除民衆痛苦，增進民衆福利而努力。^①

留學歐美，提出近代史研究計劃

五四那年的夏天，傅斯年考取了山東的官費，將往英國留學。十一月十九日，新潮社改組，羅先生被選為編輯以接替傅的主編職務。^②民國九年秋，由於北大校長蔡元培氏的「特達之知」，使羅先生與段錫朋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決定先到美國，再去歐洲。段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羅先生入普林斯登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研究歷史與哲學，一年以後，因受杜威教授 (Prof. John Dewey) 和 Dean Woodbridge 的吸引，也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求教。當時哥大不僅以哲學和教育學著名，而且其所聘的歷史系若干教授如 Carlton Hayes, Dunning, Shortwell 等，也都是一時人望。蔣廷黻氏就在這個氣氛之中寫他的博士論文。也曾多次和羅先生談到有關中國史學及其研究的方法。^③他們所談的問題，顯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關，如蔣氏後來一再述及「最早賞識我，勸我做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羅志希。」^④蔣氏自民國十三年由美返國任教天津南開大學後，即從事於近代中國外交史料的搜集與研究。^⑤同時更注重介紹歐美人士對於中國近代史各種問題的新見解與新觀念。^⑥

民國十二年冬，羅先生由美赴德，就學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⑦當時在歐留學而常相過從的有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金岳霖、段錫朋、周炳琳、毛子水、姚從吾，^⑧以及趙元任、徐志摩等。真是集一時人才之盛！這時大家治學的

^① 「民國百人傳」(三)頁200。

^② 周策縱前文(明報月刊七一號)。

^③ 羅家倫「壇坫風濤」，見「逝者如斯集」頁200。

^④ 同上，頁201。

^⑤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上卷自序(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⑥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一冊「導論」頁9(包遵彭等編，民國四十五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

^⑦ 據「逝者如斯集」頁187自述。惟「民國百人傳」(三)頁200謂羅在民國十一年入倫敦大學。再據羅家倫「科學與玄學」自序(一九二四年十月於柏林)謂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秋尚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⑧ 羅家倫「朱駱先先生的事蹟和行誼」，見「逝者如斯集」頁187~188。

風氣，有一共同的趨向，就是先博後專。各人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慾而外，還有想在學術裏求創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言。如羅先生所述：這種風氣，也頗有一點係當時法國「百科全書家」(Encyclopaedist)的風氣；雖然各人的造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就各有千秋，絕難對比。如陳寅恪之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央亞細亞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還有希臘、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滿文、蒙文、藏文等，供其參考運用的總計不下十六、七種之多！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人。如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的研究；從歷史、法理、到音樂，再從音樂到彈道學，和再進而研究戰略戰術。如傅斯年從實驗心理學到物理、化學及高深的數學，再進而歷史語言學。³⁹而羅先生則從文學、哲學、歷史學而兼及教育學、民族學以及地理學。在其後來主持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而能具有各種學術的廣泛知識而求其均衡的發展，並注重學生基本學科的訓練，顯然是由於這種「先博後專」的風氣所形成。

民國十四、五年間，羅先生遊歷英法，入巴黎大學，⁴⁰並赴英國牛津大學，注意於中國近代史料的搜集。⁴¹十五年春，提出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劃，其初步即為收輯史料。要點如下：

- 一、可以設法購得的原本史料（如當時所得的林文忠親筆所批檔案）。
- 二、不可購得而可照像或鈔寫的（如倫敦、巴黎等大圖書館所藏之重要中國史料，如洪楊文件，景善日記等。中國方面材料如清宮所藏秘密文件，亦得速鈔速照，以免孤本喪失的危險）。
- 三、尙可得到的絕版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當年耶穌會教士論中國的書信，講鴉片戰爭的書等。如不急買，將來更難買。
- 四、隨時購買新出的西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如前德國庚子聯軍大將瓦德西

³⁹ 「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見同上，頁173~176。

⁴⁰ 夏文俊「羅家倫先生年譜」謂民國十四年赴法巴黎大學深造。據羅譯柏雷「思想自由史」(John Bagnell Bury,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譯言謂其民國十五年四月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⁴¹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見「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一冊頁51~80。以下簡稱「研究近史方法」。本文頁60及64提及在歐洲到牛津大學搜集史料。

所出回憶錄等，為研究庚子一役史事之決不可少的書籍。

五、尚可得到，但是已經版的中文書籍關於中國史料者。

六、隨時購買新出的中國文字的史料。

羅先生以為設能按此計劃進行，而每年有兩萬圓（當然不能充足，但可將就）可以分配，則十年以後必大有可觀。上項計劃，經過羅的朋友清華研究院教授陳寅恪氏據以向清華當局建議，並得趙元任氏的贊助，擬即籌款委托羅先生就其（二）（三）兩項着手在歐各地搜集。嗣因清華教務長的更迭，復以北京附近發生戰事，致無人負責而告停頓。雖使羅先生感到「此等工作，日本人早經注意，而中國尚無萌芽，可嘆！可嘆！」但他並不氣餒。這年夏間回國後，即決心接受東南大學聘約，以便就近可以利用上海東方圖書館及亞洲文會所藏近代史料。同年九月八日，復致函主持廈門大學文史研究的沈兼士教授，希望廈門大學能繼續清華未能實現的計劃，使廈大將來能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寶藏及策源地」。同時更提出具體可行事項：（一）請廈大立即撥款一萬元託請陳寅恪氏迅將故宮所藏軍機處檔案攝製副本；（二）如廈大予以經濟資助，則渠本人亦擬於民國十六年初夏前赴北京專心研究清宮文件；（三）立即設法收購湘鄉曾氏家藏李秀成供狀原件。不幸其後因時局關係，此一計劃又未能實現。^④

參加北伐，嚇不走的革命黨人

羅先生於民國十五年夏自歐回國後，任東南大學教授，時適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北伐，當年在歐留學的羅先生好友如傅斯年、朱家驊、段錫朋等氏都已先行回國，傅、朱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段隨革命軍到江西從事黨務工作。十一月間，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先生駐節南昌，任命羅先生為總司令部參議，旋又任為總司令部編輯委員會委員長，參加北伐戰役。十六年四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並實行清黨。國民黨中央為培植黨政人才，決定創辦中央黨務學校，派定籌備委員九人，計為蔣中正、胡漢民、戴傳賢、丁惟汾、陳果夫、吳倚滄、曾養甫、劉蘆隱、羅家倫九位先生，以蔣先生為校長，戴為教務主任，羅副之；丁為訓育主任，谷正綱副

^④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一冊導論頁7~9。

之；陳爲總務主任，吳挹峯副之。校章規定有一校務會議，以校長爲主席，各處正副主任爲委員。就當時停頓中的東南大學商借一部分爲校址。由於戴的公務較忙，教務方面的責任，羅先生擔負較多。學校開學未久，蔣總司令即於八月十二日通電解職下野，各處主任也離開南京，羅即受命代理校務會議主席。八月二十四日敵軍孫傳芳軍約五萬餘人，渡過長江，攻打南京附近的龍潭，切斷京滬間交通，南京的局勢萬分緊張。羅先生適於交通斷絕的前一日，赴滬爲黨校籌款，於當晚趁夜車趕回南京。二十六日，正當龍潭戰役危急之際，羅先生除與軍當局保持聯絡以便隨時配合行動外，並安慰全校師生，說明他由上海急於趕回的原因，正是要和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他正告大家：「世界上祇有殺得死的革命黨人，決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④這種氣魄，正如八年前他在五四宣言中所說「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精神。

民國十七年一月，蔣總司令復職，繼續北伐。三月，總司令部設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以蔣作賓爲委員長，羅先生及蔡公時等爲委員，羅兼教育處主任，蔡兼外交處主任。並從黨校中選拔學生約百人，隨軍北伐，擔任前線政治工作。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發生，蔡公時等遇難。日軍師團長福田且於七日向革命軍蔣總司令提出通牒，限「十二小時內」答覆。八日上午，羅與熊式輝奉蔣總司令命以「軍使」名義，穿過日軍防線，進入濟南與福田交涉。據羅自述：「福田態度驕傲蠻橫，在談判過程中，他尤其堅持要將陳調元、方振武、王均的部隊在日本軍前繳械。我們是決不肯，也斷不能屈服的。他們滿臉凶煞之氣，以怒目惡聲相向。我們終始沉住氣來，以堅定的態度，據理力爭。當然在這個場合之下要求得到任何理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要求他以書面答覆，讓我們可以復命；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再寫一個蠻橫的文件，將來可以公諸世界。」^④當熊與羅先生離開濟南距革命軍防地黨家莊不過三四里時，兩面的軍隊已開始以密集的砲火互相轟擊，子彈橫飛，兩人乃後退約二里，遇到一輛日軍的裝甲砲車，車上跳下一名日兵以槍對着兩人胸口，兩人昂然而立。日軍又以砲口對着熊的頭部，車上又跳下一名軍官，出以威嚇態度。兩人毫

^④ 羅家倫「世界上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民14. 8. 26），見「文化教育與青年」頁122（民國四十一年臺北華國出版社）。以下簡稱「文教青年」。

^④ 羅家倫報告在濟南事變中之經過（民17. 6. 14），見「革命文獻」第十九輯頁1350~51（黨史會編）。

不畏懼，並告以所負任務。日軍無詞以對，乃讓兩人繞道而行。經由泰山山脈，步行二十小時左右，又饑又渴，大約走了一百三十多里，才到達革命軍防地張夏車站，再乘專車回到泰安向總司令復命。^④羅先生這一表現，真是做到了「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主持清華，學術獨立

羅先生於民國十六年六月，隨北伐軍進入故都為中央黨務學校在北京招收新生後，即回南京。八月十七日，國民政府決議將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直接受國民政府管轄。二十一日，任命羅為校長。據羅先生回憶說：「政府任命我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時候，並不會宣布把清華改為國立大學，也不會頒布他的組織規程。所以我當時奉到的命令，乃是清華大學校長，而不是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聽說不加國立二字，乃是當時外交部王正廷部長的主張，說是恐怕美國朋友看了不高興！」據羅先生說：「但是革命的時代，還有一批人有一點革命的勁兒」。就憑這點革命的勁兒，首先把清華大學定為國立，並進行一連串的改革措施。繼又將清華的基金管理及清華的隸屬問題加以解決，以解除清華發展前途的根本障礙。

將清華定為國立一事，據羅先生自述：在其校長任命發表以後，大學院長（當時的教育部長）蔡元培先生要他擬定組織規程，他便與大學院兩位有關組長擬定了規程。據羅先生說：「就本着這點革命的勁兒，把清華定為國立。這草案蒙蔡先生核准了，提出國務會議通過。」^⑤

民國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羅先生就在職清華大學校長的典禮致詞中，提出「學術獨立」四個字，來對清華進行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他首先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從這一天起把美國庚款興辦的清華學校——以往留美預備學校的生命，轉變而為國家完整大學的生命。因之，他首先宣布停止舊制全部畢業生派遣留美的辦法，而以公開考試的辦法，選拔少數成績優良的學生到美國去深造。同時並以純粹學術的標準，重行選聘外籍教授。經過改組後，留下的十八位教授，都是學問與教學經驗很豐而有

^④ 同上，頁1353~55。

^⑤ 羅家倫「一個饒有興趣的鬭爭」，見「文教青年」頁116。

成績的；至新聘的教授，也都是積學之士。他申言：既是國立大學，自然要研究發揚我國優美的文化；同時接受西洋的科學文化。不過我們接受的辦法不是佔在美國方面，教中國的學生「來學」；乃是站在中國方面，請西方著名的，第一流不是第四五流的學者「來教」。

至於清華院系的調整和組織，羅先生在北上就職以前，已和大學院長蔡元培先生商量好，決定先成立文、理、法三個學院。文學院分設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哲學、歷史、社會人類五系；理學院分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五系；法學院則僅設政治、經濟兩系。迨羅到北平後，又深感中國土地之廣，地理知識的缺乏，不能再如過去從文史上談論地理，今後必須在科學上把握地理，即從地形學、地文學、測量學、製圖學乃至航空測量學，以得精密可靠的地理知識，故又增設地理系。同時增設土木工程系而注重於水利，以研究華北水利。羅先生宣稱：清華的發展，應先以文理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長其他部門。

對於師資，他申言必須破除一切情面，憑着學術的標準去為青年擇師。至於學生，要做到沒有一個不經過嚴格考試而進入清華的學生；也沒有一個不經過充分訓練、不經過嚴格考試，而在清華畢業的學生。同時宣布開始招收女生，他說：「男女教育是要平等的」；「更不願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這正是當年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的新作風。

羅先生認為「研究是大學的靈魂，專教書而不研究，那所教的書必定毫無進步。不但無進步，而且會退步。」而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設備。不過他認為清華當時的弱點，是房子太華麗，設備太稀少。設備最重要的，一是儀器，一是圖書。因此他宣布今後每年在大學總預算裏至少規定百分之二十為購置圖書儀器之用。並呈准大學院，垂為定制。

關於清華的基金問題，羅先生宣稱他發現「其中四百多萬元的存款，已化為二百多萬元。」他表示要負責來進行這件事，以求清華經濟基礎得到穩定。同時表示他要把清華納入大學的正軌系統，使清華能有蒸蒸日上的機會。^④

羅先生一連串的改革清華計劃，特別是關於清華的基金問題，却引起了於基金

^④ 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民17.9）見，「逝者如斯集」頁7~15。

有利害關係人的注意。這一問題的發生，是民國十八年四月羅先生到南京向清華董事會提出行政報告和下學年度的擴充計劃時，結果是件件被否決。尤其使他憤慨的，是清華每月的經常費由美使館退到基金保管委員會，再經該會職員將美金換成國幣交到清華時，却使清華每月損失一萬餘元。於是乃以辭職來表示其抗議。要以他的辭職來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系統的正軌化。

原來清華雖已改爲國立，但其中尙有不徹底的一點，就是在隸屬上爲了遷就外交部起見，把它交給大學院與外交部共管，再由兩機關派人組織董事會。至於基金的保管，不在規程中規定的。由於美國退還庚款的關係，在北洋政府時代，有一個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由中國外交總長、外交次長及美國駐華公使三人組織而成。外交部既佔三分之二的多數，對於這筆基金自可自由運用，甚至拿來做公債生意，做投機買賣。當北伐軍於民國十七年六月克復北京時，羅以戰地政務委員兼教育處主任調閱檔案，發現湯姆生會計事務所檢查清華基金的報告，其中有陳籙龍烟鐵礦的股票二十萬元，列在基金數目裏；據會計師估計祇值銀洋一元。其餘這類的廢紙頗多，都用來抵換了基金的現款。其中二百萬元左右的公債是永遠不會中籤的；因爲一中籤便換走了。一兩月間銀行的倒帳是四五十萬；有的還是第一天存進，第二天倒帳的。於是名爲四百多萬的基金，實際上至多不過二百多萬。北伐以後，基金保管委員會中的外交次長雖以大學院長替換，但保管的機構還是在外交部手裏。而蔡先生又是十分君子待人的，自然不會和他們爭權。羅先生既深悉此中弊端，於是在他四月十一日提出辭職的前兩天，便擬好了一篇萬餘言的長篇談話，把清華基金的積弊，根據湯姆生會計事務所查帳的報告，又把清華共管制度下的困難，一起宣布出來。四月十一日，上海各報全文刊載；而葉楚傖主持的民國日報，且以一版全幅刊載。於是引起國內外的注意。在廣泛的輿論支持下，外交部也深感壓力重大。於是行政院要教育部（大院學改制而來）和外交部在南京召集基金保管委員會來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羅因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即這項基金不由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管理，也不交清華大學校長管理，而交給中美人士合組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主權屬於清華，支配權屬於教育部。由於這一辦法，羅先生事前曾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商談過，並獲其了解與支持。故在開會時，馬雖不能親到南京出席，却

指示其代表駐南京總領事潑萊在會中支持羅先生的主張。從前外交部總以為美國方面不好說話來做要挾的藉口，現在竟無所施其技了。於是清華的基金保管問題，得以順利的解決。四月三十日，行政院訓令教育、外交兩部將這項基金移交給中華基金會。八月二日交接清楚。風雨飄搖的清華基金，從此乃得安定與增長。⁴⁸

關於清華隸屬問題，羅先生本諸一不做二不休的態度務求其徹底解決。當時教育部長蔣夢麟對於改隸問題雖很同情，但為避免爭取機關的嫌疑，不願與外交部直接衝突，勸羅先生不要操之過急。但羅先生決心貫徹到底，乃向出席國務會議的戴傳賢和陳果夫氏說明原由，請求提交國務會議解決。這是在行政院會議以上的一個會議，教育、外交兩部部長都不出席，故可避免兩部的爭執或調和折衷。經過戴、陳兩氏的贊同，羅於是代擬一個提案，取消兩部共管制度，並取消因此而產生的董事會這個畸形組織，將國立清華大學單純直接的歸教育部管轄。這一提案由戴、陳兩氏親自簽名提出。事先羅先生並向國民政府蔣主席陳述理由得其首肯後，復訪晤出席會議的譚延闓及孫科，均獲其贊同。因之，這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國務會議就將此案順利通過。從此清華在行政系統上納入國立大學的正軌，在制度上給予清華前途發展的障礙完全掃除。⁴⁹

以上兩個根本問題解決以後，羅先生再度請辭清華職務，並即前往杭州省親。在其遊覽西湖之際，遇到杭州一位藏書家楊老先生願意出讓他的豐華堂全部藏書，羅即電清華圖書館主任洪範五南下與其洽商。結果以三萬四千元購得三萬八千冊的大收藏，其中頗多善本。不久，羅奉到五月十七日國民政府第二次慰留的命令，遂於六月十二日回到清華⁵⁰。

羅先生回到清華後，更以積極的精神來擴充清華的設備。首先建築生物館，其容積比原有的科學館大百分之二三；其次建築氣象臺，附設於地理系。民國十九年春，又動工擴建圖書館，比原來的容積大三倍以上。對於圖書館的建築，羅抱定兩個原則，一為圖書館藏書量，可以無限度的增加，使書庫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斷的推進；一為圖書館要有一個偉大的閱覽室，可設一千個座位。藏書方面，除購入豐

⁴⁸ 「一個饒有興趣的鬭爭」，見「文教青年」頁116~118；「民國百人傳」（三）頁203。

⁴⁹ 同上，頁119；「民國百人傳」（三）頁204。

⁵⁰ 同上。

華堂的收藏外，又在北平購進了大量近代歷史檔案文件。此外還計劃建造體育場、化學館及水利工程室。羅先生以爲：「必須如此，學生才不願意老躲在宿舍裏高臥隆中，而樂意上圖書館、實驗室、體育館和操場。」^{⑤①}

在這種積極精神推動下，教授的研究工作和學生的讀書風氣都與日俱增。經過短短的數年，居然培養出來許多學者；尤其是科學家，其中還有幾位得到國際榮譽的科學家。^{⑤②}此外在史學方面，如蔣廷黻氏對於近代中國外交史的有計劃研究；以及羅先生本人亦利用餘暇在故宮文獻館參閱總理衙門檔案中有關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資料，撰有「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一書。^{⑤③}

武大教授，提出研究近代史的方法

民國十九年五月，中原大戰發生，北平落入山西閻錫山軍之手。閻派了一位山西籍的清華畢業生喬萬選爲清華大學校長，煽起學校的波瀾。這時出現一由清華同學會鮑明鈐等領導的「驅羅運動」。五月二十三日，羅先生向教育部請求辭職，並即密由天津乘船南下。天津大公報因此發表社評，以爲此種肆意攻擊大學校長之風氣萬不可長^{⑤④}。

羅先生回到南京後，即隨戴傳賢氏往河南前線勞軍，目擊當時中原戰爭的激烈戰況。九月，戰爭結束，中樞仍舊要羅回清華大學校長本任，他堅決不願再去。爲了表示決心，於是接受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之聘。^{⑤⑤}「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即在此時撰寫，發表於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年三月）。^{⑤⑥}此文實爲羅先生多年來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考 and 經驗所得，予以有系統的論述。正是他倡導有計劃的研究中國近代史進一步主張。此文的發表，距今雖已四十多年，仍不失爲研討如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論著之一。

講到研究近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羅先生以爲：要知道人類或

⑤① 羅家倫「擴大知識靈泉的蓄水庫」（民19.3），見「文教青年」頁112~114。

⑤② 「一個饒有興趣的鬭爭」，「文教青年」頁115。

⑤③ 「民國百人傳」（三）頁204。羅撰「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於民國十九年初版，二十四年再版。

⑤④ 同上，頁205。

⑤⑤ 羅家倫「政大的誕生與成長」，見「人類良心備忘錄」頁223（民國五十八年，臺北進學書局出版）。

⑤⑥ 此文收入「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一冊——史學與史料——（包遵彭等編，臺北正中書局出版）。

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而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就歷史的兩個特性——連續性和交互性——而言，尤其是交互性，則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個最有趣的對象。例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及八國聯軍戰爭，那一個戰爭不是和外國直接的衝突？那一次衝突不在國外國內發生重大的影響？還有兩次大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和辛亥革命——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何況產業革命、思想革命、和國民革命，正是繼續進行。無論是對歷史的真象負責，或是對於民族生存的適應負責，能夠不研究嗎？

講到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未能發達的原因，羅先生以為一般的看法和觀念，是第一、是學者的好古心，覺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第二、是因為恐怕時代愈近，個人的好惡愈難避免，深怕不能成為信史；第三、是因為恐怕有許多材料不能公開，將來發現，以後他人再來重寫，自己的著作不能成為定史。對於以上三點的看法，羅先生以為都不能成為不研究近代史的理由。因為第一、從學術的眼光看去，什麼材料都應當平等看待。第二、史學家重在客觀，不能以主見來影響事實的真象，例如孔子作春秋，其中有七十三年便是他自己經歷的時代；司馬遷做史記，不在漢武帝以前停止，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三、說到許多文件不能公開，的確是一件憾事；不過他認為不能公開的材料，除一小部分外交政治的秘密外，其他還是汗牛充棟；況且中國的外交內政，簡直沒有多少秘密可言；至於史書的定本，這是很難定論的。

儘管羅先生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困難的克服，持以樂觀的看法，但他對於中國近代史料文獻的喪失之快，極感痛心。例如鴉片戰爭時所用的噴筒——當時重要的火器——祇是在南京第一公園裏看到一個。庚子戰役時的武器、旗幟、告示，以及民間所貼的「花紙」，祇有外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裏還可以看到。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報紙雜誌，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簡稱黨史會）四處登報徵求，已經有許多是不可再得的了。當民國十七年他隨北伐軍進入故都時，目擊各部檔案的散失，曾經設法加以挽救，雖然不無效果，終因範圍太大，機關太多，致告束手。曾經建議設立檔案保管局，也因經費困難，不能實現。而他却看到日本人在民國十六年上海

清共的時候，把各種標語照下像來，印成二冊，這是何等留心！何等利害！因此，在國家的力量和當局的認識，還沒有能夠注重檔案的保存時，各處圖書館應該盡其力量；而史學家的尋訪搜集，亦極重要。這也是羅先生以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方面最重要的工作。

講到歷史或近代史的研究方法，羅先生以為嚴格的講，歷史研究法祇是史料研究法。其步驟可分為史料的尋訪、搜集、整理、考訂、發表。而其基本的工作，則為史料叢書的編訂。就近代史來說，他認為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因此他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

如何整理中國近代史料，來編成叢書？羅先生把它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國文的史料，可分為檔案、官書、禁書、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專家著述、定期刊物及圖畫等七種。第二部分為外國文的史料，可分為檔案、官書、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專家著述、定期刊物和圖畫等六種。第三部分是專題研究或分題研究的結果。此外還有一些有關近代史工具書的著作，也很重要，如中西曆的對照，外國人的中西名字對照表等。

羅先生提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所以特別強調整理史料的重要，一方面是要「文獻足徵」，同時乃在放開眼光，擴大範圍，隨時隨地像獵狗似的去尋找材料。材料得到以後，還有整理、翻譯、考訂的苦工。而專題研究，尤其是科學的歷史必經之階梯。因為把許多單獨的小問題研究得有眉目了，對於大問題的著作，方不致流於空想。這樣才可以動手寫科學的中國近代史。^⑦

上述羅先生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見解，在他晚年主持黨史會時對於黨史史料整理工作的注意，極有關係。

主持政校教育，以革新政治為雪恥圖強基礎

羅先生為決心擺脫教育行政，重理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才到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不久，蔣主席到武漢巡視，要他回任清華校長或去南京幫忙；復提請中央

^⑦ 以上均參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任羅先生為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羅先生辭謝不獲，乃於民國二十年一月到南京受任。

羅先生對於政校的教育和訓練有其一貫的主張，即知識技能的訓練，是要經過相當長期的。原來政校是由中央黨務學校改制而來，羅先生亦是校務委員之一。黨校教育期限原為六個月，因羅之建議延長為一年。民國十八年改制時，羅極力主張改為四年制的政治大學。但未獲通過。遂採取一項折衷辦法，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教育期限定為二年半，其中半年為實習。後又經羅的建議改為三年，再加半年的實習。這次羅先生回任政校，乃決定改為四年制，四年級第一學期為實習期間，第二學期仍須回校討論、研究和撰寫論文。由於中央仍有人主張不必用大學名義，故於中央政治學校之下設置大學部，作為學校的主幹。同時重新釐訂本科學系，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社會經濟、外交、教育六個學系，各系再行分組。在羅先生的構想中，要把政校辦成像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 (L'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相似的標準。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術水準已為世界所公認；而巴黎政治學校更在普法戰爭之後，出了許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復興了法國第三共和國。同時羅先生認為清末民初日本式的速成法政和速成師範，害了中國的政治和教育不少。因此他不相信短期訓練會產生什麼專家。^{⑤⑧}

羅先生認為從事政治的人，不祇要有專門知識技能的訓練，而且必須有深厚的政治修養。否則，祇能培養出一技之長的書吏，祇會活動的政客，而不能產生轉移國運的政治家。因此每年指定每級學生閱讀中文和西文名著各一種，作為課外必讀的參考書，平時要寫扎記，學年終了要考試。^{⑤⑨} 考試的評分，可以影響其升級與否。羅先生以為一個人將來要在學問事業方面有所成就，必定要受過偉大著作的陶冶，才能鍛鍊卓越的見解，和承受得了重大的擔當。^{⑥⑩}

就在羅先生回任政校的這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全國學潮風起雲湧，要求政府立刻對日宣戰。政校學生也激於愛國熱忱，紛紛要求到前方去拼一死活。羅

⑤⑧ 「政大的誕生與成長」見，「人類良心備忘錄」頁223~224。

⑤⑨ 羅家倫「從樹立學風到樹立政風」(民20. 1. 26)，見「文教青年」頁124。

⑥⑩ 同註⑤，頁226。

先生告訴他們要抵抗強敵不是趁一時之勇可以成功，他說：「我們在炮火下犧牲容易，而謀久遠的大計就很難。」因此他提出「要從政治的改革，來達到自強救國雪恥報仇的目的。」^①因之，他更提出一個顯明的口號，就是「我們要擔負普法戰爭後法國政治學校所擔負的責任。」^②六年以後，即對日抗戰發生前的兩個月，羅先生回憶說：「我們的方針，不但由客觀環境上證明是對的，而且我們在精神上更受了一種深刻的鍛鍊。……這幾年以來的國難，和全國一致經過艱危以後所得的覺悟，更證明我們當時的口號是對的，就是『我們以革新政治為雪恥圖強的基礎！』」^③民國三十年以後的事實，更證明這一教育是獲得好效果了。^④

羅先生主持政校教育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對邊疆青年教育的擴充。原來在黨校時期即有蒙藏班的設立。在羅先生回任政校後，決定籌辦蒙藏學校。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將政校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並決定在包頭、酒泉、西寧、康定、大理五地設立分校五所，以便利邊疆大量青年的就學。為此，羅先生特提出「重視邊疆上的後一代」，他說：「中國是整個的，邊疆同胞和內地同胞的利害存亡是一致的。這是歷史和時代的啓示，這是不容忽視的真理。」他認為過去甚至當時邊務的敗壞，是誤在過分重視王公喇嘛，而不從培植邊疆上優秀的青年着眼。因此他主張盡量擴充邊疆學校，注重這有希望的後一代。^⑤經過四年的努力，由原來二百多名的蒙藏生增加到一千多名。^⑥當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收復百靈廟的戰爭開始前幾天，羅先生前往綏遠包頭視察蒙藏分校時，看到三百多位蒙古學生，穿了政校的制服，佩了政校的校徽，用他們自己組成的樂隊在沙漠邊緣來歡迎他，使他感動得幾乎流淚。以後他到酒泉、西寧、大理各處去視察，都有類似的情形和感覺。^⑦

羅先生主持政校教育達三年之久，到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以中大校長職務太忙，無法兼顧，始辭去政校職務，而由程天放繼任。^⑧

① 羅家倫「九一八噩耗的來臨」（民20. 9. 21），見「文教青年」頁132。

② 羅家倫「造成共同建設的政治意識」（民22），見「文教青年」頁134。

③ 羅家倫「回憶」（民26. 4. 18），見「文教青年」頁139。

④ 「民國百人傳」（三）頁205～206。

⑤ 羅家倫「重視邊疆上的後一代」（民22），見「文教青年」頁136。

⑥ 同註③，頁138。

⑦ 同註③，頁228。

⑧ 中央政治學校大事記，見「革命文獻」第五十六輯，頁417。

主持中大，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羅先生又接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這是中大經過長期風潮以後的事。原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全國學潮蠡起，首都所在地的中大校長問題亦因學生的反對而久懸不決。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決定派教育部次長段錫朋暫代，於翌日赴校視事竟被學生毆辱。行政院因下令解散中大，並組織整理委員會從事整頓。八月二十六日，行政院任命羅先生為中大校長，在其懇辭未准之後，即於九月五日到校視事。十日舉行中大學生甄別考試。十月三日正式開學，十一日全校上課。這天，羅先生在中大集會中宣布治校方針，以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中大的最高使命；並以養成新的學風為達成這一使命的先決條件。因此提出「誠、樸、雄、偉」為新學風之目標，而以增加設備、準備學術環境、多聘學者講學、注重基本課程、提高學生程度，為實際進行步驟。^⑥

羅先生接長中大時，正值一個大紊亂以後，故對辦理中大計劃，分為安定、充實、發展三個時期，每期約略三年；不過在安定時期，應當有充實；充實時期，應當亟謀發展；但到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在最初二年，安定的目的達到了，以後二年更加注意充實。不但充實圖書儀器各項設備，而且充實課程內容和教學人才。起初四年花費在圖書儀器及教學設備等項費用，即達二百二十三萬元，超過全部預算的四分之一。西文專門雜誌定到七百餘種；重要的全套雜誌自出版以至當時的增購計有六十種。中文書籍也有大量的增加。^⑦

由於國難的嚴重，為使中大負起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責任，有些設施必須適應國防建設。民國二十二年夏廬山會議討論如何培植航空工程人才時，根據羅先生的建議，因航空工程需要若干基本科學和應用科學來幫助，以在大學設置此科為宜。並決定在中央、清華、交通和武漢四個大學創辦；由於清華和交通所處地點較為暴露，武漢離空軍中樞較遠而不便，乃決定以中大為主體。又以國家的需要迫切，如由大學一年級訓練起，實在緩不濟急。因先設立「特別機械」研究班，招收各大學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和電機工程三系的畢業生，再加以兩年航空工程的訓練。招生

^⑥ 羅家倫「中央大學之使命」(民21.10.11)，見「文教青年」頁140~146。「民國百人傳」(三)頁206。

^⑦ 羅家倫「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民30.8.13)，見「文教青年」頁243。

方式，分函各著名大學工學院院長及教授，請他們分別通知並勸導優秀的畢業生參加考試。民國二十三年秋開始招生，計錄取二十八名，分為三組研究，計空氣力學、結構及發動機。研究班開學時，羅先生向二十八名研究生講話，指出用「特別機械」這一名詞，實在是「悲痛的隱蔽」，為的是避免打草驚蛇，引起日本人的無謂擾亂。^①到了抗戰發生以後，中大又增設航空工程系及航空工程訓練班，連同「特別機械」研究班，計有學生一百五十名左右，畢業的則有二十多人。^②這雖然為時較遲而人數不多，但已為抗戰做了直接的貢獻。

民國二十五年，是羅先生主持中大的第五年，他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機到了。同時更認為首都大學當國家積極發展一般教育而且迫切需要人才的時候，決不應該是一個祇能容納一兩千人的大學。他又認為中大的現址為首都城市中心之地，車馬喧囂，市氣逼人，不適宜研討學問，培養心身。因決計在南京郊外建造一個能容納五千至一萬學生的首都大學，不但環境優美，格局軒昂，且有安置一切近代化的實習工廠和農場之餘地。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亦非常贊成此一計劃。經向中央全會提出一項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當獲通過。建築費先定為二百四十萬元，按月撥付。新校址選在南門外約七公里石子岡一片地方，氣象宏大，山林起伏，佈置起來，又可非常曲折，且宜於防空。該地經羅先生與教育部長王世杰親往勘察兩次，並邀請一位曾為蘇俄五年計劃設計學校建築的德國工程師來看過，也認為地點適宜。於是經政府核定，計圈地八千餘畝，並公開徵求建築圖樣。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招標開工。動工興建者計有工學院的本院，航空工程系的教室及實驗室，農學院的本院。正在進行設計的為理學院、圖書館，與大運動場。預計三十個月全部完成。合計需款五百七十餘萬元。這年七月一日，羅先生將此全部計劃携往廬山呈報蔣委員長，獲得批准，並允撥二百萬元。但不到幾天，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於是這一偉大的學府建設事業，竟陷於功敗垂成。^③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羅先生即於七月十四日自廬山飛回南京。他知道此時已是

^① 羅家倫「悲痛的隱蔽」，見「文教青年」頁151~152。

^② 羅家倫「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個性」（民27.5.1），見「文教青年」頁194~195。

^③ 「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見「文教青年」頁243~246。

「最後關頭」。次日，即開始作遷校的布置。十六日，重往廬山參加具有歷史性的廬山談話會。二十日後回南京，即囑中大總務處將一年前預備好的大木箱先行取出五百五十支，把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而中大即連續數次遭到日機的投彈，科學館、牙醫專校、男女生宿舍等均被炸燬。很幸運的，所有貴重儀器圖書適於被炸前夕運到下關英商躉船上去了，故得保全無恙。

在羅先生決定遷校之際，曾派了幾位教授分赴重慶、兩湖及成都等地尋覓校址。經過調查聯絡，決定將中大本部遷往重慶，醫學院遷往成都。當時頗引起校內外人士的反對，校外人士有主張遷上海、安徽九華山或牯嶺新圖書館內的；校內人士有主張遷武昌、沙市或宜昌的；也有主張在南京城外掘防空洞上課的。議論紛紜，阻力甚多。但羅先生認定這次抗戰是長期的，文化機關與軍事機關不同，不便一搬再搬；同時所遷地點，以水道能達者為宜。而且重慶不但軍事上險要，且宜於防空。基於這種理由，羅先生乃晉謁蔣委員長詳陳理由，獲得同意，於是放手做去。九月二十三日，奉到准遷重慶的部令，即命派在重慶的聯絡人員迅速動工建造校舍；同時通知全體教職員及學生應於十月十日集中漢口，轉船西上。十月初，南京的物品大致遷移就緒。羅先生亦於十月五日離開南京，經蕪湖到屯溪，主持十月十日的大中實驗學校開學典禮後，即於二十五日由漢口抵達重慶。這時已有一部分教職員和學生到達重慶了。可容一千餘人的新校舍，也在日夜趕工下，竟於四十二天完成。十一月初，開始在重慶沙坪壩新校舍上課。^⑭這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遷校，如同羅先生在四年以後所追述：

「雖然正當猛烈的戰爭，經過長途的跋涉，我們的功課，開得還是很整齊的。我們的圖書儀器，都已搬出，而且展開使用。不但重慶本部開學，並且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已先本校在成都開學了。我們教學的標準，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止，還沒有比在南京時降低。我們這次搬家，成者可以算是較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做了國府為主持長期抗戰而奠定陪都的前驅。」^⑮

^⑭ 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民30.6.16），見「文教青年」頁222~228。

^⑮ 同上，頁228。

民國二十七年，中大學生人數激增，沙坪壩的校舍不敷容納。於是又選了一個風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增建可容千餘人的分部。同時，院系也增多了。計新增一個師範學院，增七系一科；工學院增航空工程及水利工程兩系；電機和土木工程由單班加到雙班；機械系加到三班；醫學院增辦一所大規模的醫院。綜計起來有七個學院，一個研究院，一個專科學校，一個中等學校。計為五十六個系科，九個研究部，共六十五個單位。此外還有附屬醫院、農場、牧場、工廠等。學生人數，民國二十六年在南京註冊時為一、〇七二人，到三十年六月增為三、一五三人。所開課程，在南京最後一學年全年共為五二四種，三十年的下學期則為八二九種。^⑥學生、院系、課程、教員都在大量的增加，物價也不斷增高（十倍），但全校經費不但未能增加，反而減少。在南京，每年有一百七十二萬元，民國三十年可領的經費不過一百六十六萬四千元。但沒有欠過薪，學校照常進行。^⑦更艱苦的是敵人的飛機不放過中大，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即連續被炸三次。如同羅先生所說：「我們和頑皮小孩子一樣，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洞去；敵機走了，立刻出來工作。」^⑧由於戰時物價的上漲，還有校中許多柴米油鹽的雜事，要來發生麻煩。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羅先生仍然不忘其幽默，在他和葉楚傖的詩中有云：「官家籌箸關鹽鐵，學府平章到米柴」。也是當時生活的寫實。^⑨

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是中國抗戰第四週年，也是中大舉行遷校重慶後的第四屆畢業典禮。這批畢業學生正是四年前在南京中大被轟炸的一天定榜取錄的；這天仍然在炸彈底下送他們出校。這次畢業學生計為四百三十人，其中有幾系的畢業生是以前沒有過的，如航空工程與水利工程系的畢業生，都是第一次；醫學院的畢業生尤可珍貴，因為在沒有經費的預算下東湊西挪的辦了六年，如今也看到了第一班醫科和牙科畢業生了。研究生授予碩士學位的七人，雖然人數不多，而中大的研究院也是從羅先生手上開辦的。最使羅先生足以告慰的，是由於將南京的圖書儀器一齊運出，四年以來，尙能勉強應用，使教學水準，不曾降低。^⑩

^⑥ 同上，頁229～232。

^⑦ 同註^⑥，247頁。

^⑧ 同註^⑥，頁233。

^⑨ 同註^⑥，頁247。

^⑩ 羅家倫「七七與中大」（民30.7.7），見「文教青年」頁235～236。

由考察西北到出使印度，致力邊疆事務

民國三十年八月，羅先生接長中大整整十年。他說：「催人的歲月，使我在中央大學已屆十年。現在向我患難相共的教職員先生們和同學們告別了！」他覺得「我們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機會，來為大家準備下一個環境做學問，這是大學校長的定義，這也可以說是大學校長的悲哀！」^⑧

在羅先生卸去中大校長後，即於九月二十一日由中樞任命為滇黔區考察團長。^⑨時值抗戰情勢，艱險益著；世界大局，復如暴風雨之將臨。中央大軍正待命入滇，以備應付滇緬邊境隨時可能發生之事變。然龍雲據滇驕縱，疑慮難消，迎拒之念，動蕩轉劇。十月，羅先生赴滇黔考察，遍歷二省，巡視三邊，凡屬重要地區，均先遠征部隊到達，宣示中央德威，融洽地方感情，成效至著。十二月八日，到雲南下關視察滇緬公路時，忽聞珍珠港事變發生，實係日本軍閥「自掘坟墓」。乃在下關廣場對滇緬路上將士及員工與民衆八千餘人演講，宣布此一振奮消息，全場狂呼歡躍。世局從此改觀。當晚與駐軍將領聚餐，不禁痛飲，口占一絕：「一段相思萬劫灰，姍姍終見美人來。今宵莫話相思苦，先爲蒼生進一杯。」考察任務既畢，遂即返渝復命。^⑩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新人生觀」一書付梓。這是羅先生在中大西遷以後對全校的一系列演講，曾發表過數篇，今重新改寫，成爲專書。此書之趣旨，羅先生在其自序中說：「自從神聖抗戰發動以來，我就開始想做一點積極的思想工作。……我祇想把中國民族思想和生命中，我認爲缺少或貧乏的部分，特別提出來探討，來發揮。」^⑪此書於三十一年在重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頓成「洛陽紙貴」之勢。每次重印出書，常在兩三星期後即銷售一空。到抗戰勝利後一年止，在各地翻印的計達二十七版之多！打破商務印書館四十多年來除教科書和字典以外任何書籍的紀錄。^⑫

⑧ 同註⑦，頁242及243。

⑨ 夏文俊「羅家倫先生年譜」，見「新知雜誌」第三年第三期44頁。

⑩ 「心影遊蹤集」上冊頁32及44。

⑪ 羅家倫「新人生觀」自序（民國六十一年華國出版社臺北第十二版）。

⑫ 同上，臺版自序。

在羅先生考察滇黔以後，中樞正擬經營西北，將付以部分責任徵其意見。羅先生以父老居貴陽，如遠行出關，恐因此引起老人暮年之感觸，因一再力辭。迨三十二年三月二日，在渝忽得父逝貴陽噩耗，次日侵晨，赴黔奔喪。^⑥時適新疆政局轉變之機漸臻成熟，新疆督辦盛世才輸誠中央之跡象漸著，於是中央乃有新疆監察使之建置，以羅先生為監察使，並兼西北考察團長，從事於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國防建設之考察與設計。考察團之內容計分鐵路、公路、水利、農、林、畜牧、墾殖、工、礦、民族、教育、衛生等凡十二部門，配合政府各部會中負責有關部門之專家，及其他學術與事業機關中之專家學者組成，先後參加者凡四十六人。於三十二年六月七日由重慶出發，次年三月完成任務，提出詳細報告十四冊。此後復數度重返新疆以至抗戰勝利為止。^⑦

民國三十三年春間，蘇俄在阿爾太山區煽動哈薩克少數浮動份子製造中俄邊境上之軍事衝突。美國總統羅斯福立刻注意到這件事，他深怕為了邊境上的衝突，引起中俄間的重大問題，於是派其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故由俄境入新疆，再轉重慶。羅先生奉命先期飛返迪化任所。六月十八日，華萊士抵迪化，所謂叛亂部落的進攻立即停止。華萊士一離中國，則邊境的小型衝突又起。華萊士是奉命來改善中俄關係的。因為蘇俄最不能容先親共而復反共的人，所以華萊士主張調換盛世才，以緩和蘇俄。不料華萊士隨便說話，事機不密，而蘇俄的特工人員，又作搗亂性的勾結。^⑧於是八月十一日深夜，凡由中央遣派赴新任職之人員，幾被盛世才逮捕無遺。惟對羅先生居住的監察使署未敢侵犯。羅先生獲悉這是由於地方醞釀未臻成熟，未敢遽與中央開釁，乃先施此技以圖要挾固位的一種手段。因曾不斷以實況電陳中央。^⑨並建議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前來迪化尚可挽回。十五日，朱飛迪化傳達調盛任職中樞的意旨。新疆省政府因於二十九日改組，吳忠信出任省政府主席，盛調農林部長。新疆乃完全收歸中央治下。^⑩

是年秋間，羅先生因新疆問題曾數度往返於迪化重慶之間。最後回新則因蘇俄

^⑥ 「心影遊蹤集」上冊，頁49。

^⑦ 同上，頁57。

^⑧ 羅家倫「蘇俄的國策和動向」，見「人類良心備忘錄」頁76。

^⑨ 「心影遊蹤集」下冊，頁96。

^⑩ 「民國百人傳」（三）頁211。

擴大邊境亂事，發生伊寧事變。此事起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夜間。這是蘇俄與滲透當地居民準備多時之有計劃的行動。故事變一作，俄軍立即入境，伊寧城陷。中國軍隊固守伊寧城外機場待援。終因氣候惡劣，飛機無法活動，守至三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糧盡彈絕，卒致淪陷。伊犁中原人口約一萬人左右，十之八九被屠殺淨盡。羅先生在迪化安撫民心，巡視醫院，慰問傷患，不時將實況呈報中樞，提供對策。其後張治中、鮑爾漢輩提出解決新疆方案，對俄及叛逆曲盡媚態，羅堅持不同意見，因辭新疆監察使。⁹¹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羅先生駐迪化期間，重新撰寫「新民族觀」一書。此書原為戰時在中大以授課方式作系統的演講，並在他主辦的民族週刊上發表過幾篇。今重寫是繼「新人生觀」之後，將人生問題擴大到民族問題，亦可稱之為廣泛的民族哲學。他撰寫此書之目的，是要對於我們民族表現的各方面，應當重新認識，重新反省，重新估價。不但要認識自己民族，還要認識世界新的環境，新的問題，才能在新的世界中生存和發展。因此本書就民族與民族性，民族與國家，民族與種族，民族與地理環境，民族與人口，民族與經濟等關係及問題，一面從歷史的源流與演變加以探討；同時就各民族的狀況與趨勢加以比較。其中用了極多的統計數字；而兩年來考察西北所得的材料，也提供了若干問題的解釋。⁹²

抗戰勝利後，羅先生於三十四年十月奉派為中華民國代表之一，參加聯合國籌設之文化教育科學組織在倫敦之會議。會後重訪牛津、劍橋諸地。再轉歐陸憑弔法國諾曼第一帶戰場。然後經南美、中美，而重訪美國，停留兩月，參觀其戰時建設與重要學術之發展。返國時經上海、南京，而回重慶。這一次環球旅行歷時凡五閱月。三十五年五月，政府還都南京，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協助主任委員張繼從事黨史的編纂。⁹³

⁹¹ 同註⁹⁰，頁96，頁106~107。

⁹² 羅家倫「新民族觀」（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六月第二版）。

⁹³ 「民國百人傳」（三）頁212。羅先生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事，經訪黨史會舊人，謂羅先生於三十年八月卸中大校長後，中央即發表為黨史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張繼出巡西安時，羅曾至會中代其職務。其後羅出任新疆監察使及駐印大使，雖不在黨史會支薪，而其副主任委員名義仍保留。故此次還都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並非新任。仍回黨史會支薪。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決議任命羅先生為首任駐印度全權大使。五月一日離南京赴任。十七日，向印度政府呈遞國書。這時英國尚未宣布印度獨立的確期，而中華民國此舉實含有促進和象徵印度之獨立的意義。此時外交部已在南京和印度駐華大使梅農談判中印通商友好條約。羅先生赴印時，外交部即交其一份這一條約的草案，帶到印度去實地研究改進華僑待遇，和邊境界務、交通，與商務等問題。羅先生到印之後，召集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等詳加商討，簽註意見，託人帶回南京。十月十四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約見梅農大使，表示希望這項條約能夠早日進行談判，正式簽約。並將羅在印度最後修訂的草約稿件，親交梅農。葉次長且向梅農指出：一九〇八年的中英續行藏印通商章程將於明年四月二十日即屆更改之期，中國願和印度進行討論，予以修改。但中國方面的懇切表示，連同條約草案，一如石沉大海。究其主要的障礙，就是關於西藏問題的條款。在這包含三十二條的草約之中，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等三條都是有關西藏問題的。如第二十九條規定雙方應從速討論中印邊界劃界事宜，這當然是西藏與印度接界的地方。而印度却要繼承英國在西藏的傳統侵略政策——要把印度的邊境推廣到喜馬拉雅山以北。無怪這草約一遞交過去就被印方埋藏到內心中隱痛的深處去了！而且在此前後，羅先生一再發現印度官方印行地圖和宣傳影片上的地圖，竟都是將西藏畫在中國領土之外。羅先生曾以照會送致印度政府指出其錯誤，要求更正。印方初不同復，經過催詢，則支吾其詞。^④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四月，羅先生為打破中印友好通商的難關——西藏事務，而回到南京和外交部商量。於是決定分別照會英國、印度、巴基斯坦政府，說明一九〇八年續行印藏通商章程今年期滿以後，不再繼續，應該重訂新約。這個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分別送出，英、巴兩國政府均有回復，只有印度遲遲不復。等到三十八年九月羅先生到廣州的時候，和外交部長葉公超談起這件事，葉當即派人查卷。由於一部分文件已向重慶疏散，未能即時查出。到十一月十六日外交部乃從重慶復駐印大使館羅先生一電，說是印度駐華大使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

^④ 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民(39 9. 22)，見「人類良心備忘錄」頁127~129；「民國百人傳」(三)頁212~213。

二日才送給外交部一個照會，說是印度只認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條約為有效！三月二十二日正是南京兵慌馬亂的時候。待外交部查出印度復文以後，已經找不到印度大使館和任何的印度代表了。於是外交部將中國政府反駁印度照會全文由電報打到新德里。羅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接到以後，當天就整理好了，用正式的照會送到印度的外交部。據羅先生說：「這照會送出以後，我心裏覺得非常平安，因為在印度承認中共以前，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還來得及最後否認這一個沒有任何承認根據的損害領土主權的所謂西姆拉條約！」⁹⁵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印度宣布承認中共政權。印度外交部並送來一個照會，通知中國大使館說是印度決定承認中共。羅先生看了照會以後，把他預備好的召回使節的照會，立刻送出。他沉默了一回，想起中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古訓，發表了一個極簡單的聲明。其中有云：「在兩年八個月以前，我帶了我政府和人民的熱烈的希望，到印度來，來證明，來催促，來象徵印度獨立的及早實現。就這方面來說，我的使命是達到了。我很高興，印度現在是自由的，獨立的。」這聲明發表以後，不到四小時，印度一位社會名流，也是新聞界的泰斗，來到中國大使館，帶着悲痛的聲音對羅先生說：「我看見你的聲明，我的眼淚和雨一樣的掉下來。」翌年一月二十五日，羅先生離開新德里的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婦孫兒孫女到甘地的火葬場上，放了一個花圈，行了一個禮後，靜默無言地站了一分鐘。第二天即飛加爾各答轉道回國。當時有一印度報紙記載這件事，最後附了一句話說：「這一分鐘的靜默，說出了要寫多少本書都說不盡的話。」⁹⁶

主持黨史會與國史館，整理近代史料

羅先生自新德里回國後，即定居臺北，擔任黨史會主任委員。民國四十七年四月起，又任國史館館長。到五十七年冬以身體不適請辭兩項職務。其主持黨史會約為時十八年；主持國史館亦達十年之久。這是羅先生一生事業中任職最久的工作。

⁹⁵ 同上，頁145~147，按「西姆拉條約」中國並未簽字，更未批准。僅由袁世凱所派之陳貽範在草約上簽了西文拼音的姓名開頭的兩個字母；這不能算是正式的簽字。當時因輿論的攻擊，袁立即把陳免職召回，並否認陳的任何協議為有效。

⁹⁶ 羅家倫「值得印度反省，值得世界知道」（民39.7.26）見，「人類良心備忘錄」頁101~103。

以羅先生的才能和經驗，及其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見解和理想，來主持這兩個機構，真是最適當不過的了。就兩機構收藏的史料質量而言，黨史會尤為重要。但也有人認為羅先生主持這兩個機構十餘年，未能把握時機，搜集編纂關係史料，而表示惋惜者；並且認為黨史會所編「國父全集」更多不全，「國父年譜」仍多錯漏。⁹⁷無論這種批評是否恰當，但平情而論，羅先生主持黨史會時期，能以學術的標準來整理黨史文獻，則是無可否認之事實。其在黨史會初期的整理史料工作，羅先生曾有自述：

「三十九年余奉命主持黨史會，繼續整輯國父文獻，交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成『總理全集』十冊（現更名『國父全集』），蔚為大觀；自是先生（按指國父，下同）言行，多可從此中探求稽考。但該書所輯，以成篇成帙者為限，致先生墨蹟著於斷簡殘篇，而意義極為重要者，無從編入。於是另行影印『國父批讀墨蹟』，加以考訂，於四十四年由黨史會出版。又因全書體例係按文獻之體裁與性質，……不能循一貫年月予以編次；於是復選擇事蹟之重大者，編為『國父年表』，簡略殊甚，聊備檢查。至於年譜之編著，仍無時不在計劃之中。……四十五年編纂綱要既定，乃盡發黨史會所藏有關國父文獻，佐以其他載籍，歷時四載，始成茲編（按指『國父年譜』初稿。）」⁹⁸

「國父年譜」初稿是在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出版。儘管這一初稿曾被指出若干缺陷和錯誤，不過在此之前，尚無一部較為完整而翔實的國父年譜可與相比；雖然黨史會自民國十九年成立以後，即曾着手編訂國父年譜，一直到民國三十三年才有一部油印本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僅約二十萬言，且多長篇文件；即常見者亦被全錄。「國父年譜」初稿採用綱目體裁，全書約六十萬言，對於國父生平事蹟及其領導國民革命運動之經過，按照年月日的推進，很清楚的表現出來。於是大家對於國父革命運動的經過，才有較清楚的了解。由於此書運用資料之多與牽涉問題之廣，因此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視與嚴格的批評。其中以羅剛所著「羅編國父年譜糾謬」一書，⁹⁹所提批評的意見最多。其中值得爭論的問題亦多。羅先生即命黨史會同人

⁹⁷ 「民國百人傳」（三）頁214。

⁹⁸ 羅家倫「國父年譜初稿」導言（民國四十七年黨史會出版）。

⁹⁹ 羅剛「羅編國父年譜糾謬」，民國五十一年國民圖書出版社發行。全書二十餘萬言，提出批評百餘條。

虛心研究考訂，並即着手修訂國父年譜。修訂後的「國父年譜」二稿，即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時，列入紀念叢書出版。此較初稿已多所修正，內容亦大有增加，全書約百餘萬言。二稿出版後，仍保留排字底版，繼續修正補充，此即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出版之「國父年譜」增訂本。這是羅先生主持黨史會時期花費心血最多的一件工作。

「國父全集」的編訂，在羅先生主持黨史會時期，經過三次的增訂，即四十一年出版的「總理全書」，及五十年、五十四年兩次出版的「國父全集」。在民國四十一年以前，坊間雖有多種的國父全集出版，但距離「全」的程度，頗有不同，其內容較多者，當推胡漢民先生及黃季陸先生所編之兩種「總理全集」，前者為民國十九年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約一百萬字；後者為民國三十三年由重慶近芬書屋出版，約一百二十萬字。而四十一年黨史會增訂之「總理全書」約為一百八十萬字，其後兩版「國父全集」則分別約為二百二十萬字及二百五十萬字。除最近重新增訂之「國父全集」外，而五十四年版則為目前已出版之全集中字數最多的一種。「國父全集」在史料的性質而言，它是屬於「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此對研究國民革命運動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此外經羅先生編訂的國父文件中，尚有「國父批牘墨蹟」及「國父墨蹟」。^⑩

革命先烈先進的文集和墨蹟，也是屬於「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在羅先生主持黨史會時期，真是編印了不少。其主要者如「黃克強先生全集」及其「書翰墨蹟」等，也不下十數種之多。^⑪有些重要的文集或墨蹟，多由羅先生親自動手編輯，例

^⑩ 「國父批牘墨蹟」一冊，民國四十四年黨史會出版。「國父墨蹟」線裝本二卷，民國五十年黨史會出版；十六開本一冊，民五十四年出版。

^⑪ 黨史會在羅先生主持時期編印之先烈先進文集及墨蹟名稱與出版年代如下：

「黃克強先生全集」一冊，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出版。

「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線裝本一卷，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出版。

「吳稚暉先生選集」一冊，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出版。

「吳稚暉先生墨蹟」線裝本一卷，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出版。

「林公子超遺集」一冊，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出版。

「峨嵋青城紀遊」（林森墨蹟）一冊，民國五十五年出版。

「戴季陶先生文存」四冊，民國四十八年出版。

「狄君武先生遺稿」一冊，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開國名人墨蹟」線裝本二卷，民國五十年出版。

如「開國名人墨蹟」由羅先生就黨史會的大量史料中親自選出開國名人五十人的墨蹟，其標準，則以「清末民初具有革命功績之先烈先進墨蹟為主體」，並以具有歷史性者為首選。所印各件，均經考證，並於卷末附有各人事略；事略之後，再有原件之釋文。此書自徵選、編輯以至付印，歷時兩年有餘。^⑭在其扉頁中羅先生以其優美的書法題上「可以興，可以觀」六個大字，可見羅先生對此書之欣賞與滿意了。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羅先生對於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即有具體的計劃，而且認為是刻不容緩的工作。^⑮在他主持黨史會後，自民國四十二年五月起，即有「革命文獻」的編印。迄已二十多年，未曾中斷。由最初的每年兩輯編印到以後的每年四輯；由最初的每輯百餘頁編印到以後的每輯六七百頁。迄已編印六十多輯。其編印的旨趣，羅先生在第一輯的「前言」中寫道：

「要『文獻足徵』才能寫歷史，而『無信不徵』更是治史的名言。

這次大陸淪陷，不但國史館的史料落到匪手，而且公私文獻因淪陷而遭毀滅的，更不知多少。中外的事實昭告我們，國際共產黨一貫的作風，不但一方面要毀滅歷史，並且一方面還要歪曲歷史和捏造歷史。

我們感覺到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保存的史料，竟能全部遷臺，免除了這次的浩劫，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這六十年來中國的國史，和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有不可分解的關係，也是無可否認，更是無庸諱言的事實。

我們為保存史料和推廣史料的流傳，以供大家研究起見，現在刊行一種史料叢刊名曰『革命文獻』。……」^⑯

「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六冊，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三冊，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革命先烈先進傳」一冊，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開國文徵」線裝本一卷，民國五十二年出版。

「吳稚暉先生全集」（編印中）。

⑭ 「開國名人墨蹟」前言。

⑮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⑯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一輯前言，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一日。

對於「革命文獻」編輯的方法，正如他二十多年前所提出的計劃。為求編印便利，隨時可將新發現或新整理出來的史料刊印起見，每輯裏所刊載的不限於某時代，或某一件事的史料。因為史料是可以隨時增加，隨時發現的。不斷的按照史題來繼續補充，乃是應當有的辦法。^⑭ 在陸續編印的「革命文獻」所包括的史料主題，有與中會、同盟會、辛亥革命、討袁、護法、中國國民黨之改組、中俄外交及中共之滲透與清除、建軍與統一兩廣、北伐、中共之叛亂、國民政府之建制、國防建設、日本之侵略、近代教育與學術等。就史料之性質言，包含了檔案、官書、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專家著述、刊物、圖畫，甚至「禁書」等。這些史料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參考引用。誠然做到了以供大家研究的便利。

民國五十六年，更有「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的印行。這是把黨史會所藏而為一般不易看到的早期革命書刊，作有計劃的影印發行。其第一批影印二十四種，分裝四十冊。由於頗能適合各方的需要，乃又發行第二批，其規模較第一批為大，計五種四十八巨冊。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黃季陸先生接任黨史會主任委員後，又繼續發行第三批，計三種二十五冊。總計三批，三十二種，一百一十三冊。^⑮

關於革命史或近代史的專題研究或工具書的編著，羅先生撰有「七十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並指導黨史會人員編有「中國國民黨七十年大事年表」等。利用黨史會資料完成專題研究者亦有數種。^⑯ 數量雖然不多，但黨史會能由僅重收藏史料進而注重史料的編纂與研究工作，實在是由於羅先生的實行和倡導。

關於黨史會的史料開放問題，在羅先生主持黨史會時期，最為大家所爭論的問

^⑭ 同上。

^⑮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名稱及冊數如下：中國旬報（一冊），羣報精華（一冊），游學譯編（三冊），國民報彙編（一冊），浙江潮（五冊），湖北學生界（漢聲）（二冊），江蘇（六冊），黃帝魂（一冊），雲南（一冊），蘇報案紀事（一冊），蘇報（一冊），俄事警聞（一冊），警鐘日報（五冊），槍書（一冊），國民日日報彙編（二冊），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一冊），江浙鐵路風潮（一冊），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一冊），臨時政府公報（三冊），臨時公報（一冊），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藍皮書，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合一冊），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第一集介紹（一冊），中國日報（四冊，大本），民呼日報（二冊，大本），民吁日報（一冊，大本），民立報（三十三冊，大本），民報（八冊）。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十二冊），護國軍紀事（四冊），中華新報（九冊，大本），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一冊）。

^⑯ 完成專題研究者有李雲漢之「黃克強先生年譜」、「從容共到清黨」及「宋哲元與七七抗戰」，以及作者的「胡漢民先生年譜」、「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及「胡志明在中國」等書。

題。以爲羅先生「把持史料」。其實黨史會的史料，除民國十三年以後黨內的檔案及會議錄尙未達開放時期外，其餘如書刊報紙，以及很多的原始文件和報告（大多由檔案及會議錄中提出），對於外界從事研究者，並無限制。而且有的原始文件和報告，常在「革命文獻」中刊載。^④以供外界的研究參考。羅先生也曾一再指示管理史料人員，凡檔案及會議錄中可供研究參考的文件和報告，應予整理開放。但由於史庫闢處南投縣的草屯鄉間，去研究的人既不方便；同時也難找到適當的史料管理人員。因此史料的整理分類工作，始終不够理想。後來在黃季陸先生主持黨史會期間，爲求做到真正的便利研究，經向中央爭取經費一百多萬元，將史庫所有史料（不含報紙）製成卡片三十餘萬張，並予複印，以備分類。部分卡片目錄的出版，亦在籌劃之中。繼又計劃將草屯史庫遷至臺北，以求根本解決研究不便的困難。惜此項計劃亦因黃先生自黨史會退休而未能實現。

留下的著作，有待搜集與保存

羅先生自民國三十九年定居臺北後，初住溫州街的招商局招待所。後來住到黨史會爲他準備的潮州街宿舍，一棟日式的平房，僅有客廳臥室各一間。民國五十六年左右，常感喉嚨不適，發音嘶啞，顯然是由於市區空氣污染所致。因此遷到陽明山天母的新居，這是羅先生的兩位女公子久芳久華從美國寄回的一筆款子，爲羅先生夫婦購置的房子。當時羅先生每天到市區北平路國史館，中午不回天母，吃着帶來的便當，生活非常儉樸。他遷到天母後，也打算利用清靜的環境，多做些研究工作，同時也準備了必需的資料。不幸到了五十七年夏秋間，記憶力便急劇的衰退，但他仍要司機送他到國史館或黨史會辦公。正當大家關心羅先生的健康情況時，羅夫人及其女公子羅久芳女士約請黨史會的一部分同人和親友，在自由之家宣布爲使不因羅先生的健康關係，而影響到公務，決定請辭國史館和黨史會的職務。當時羅先生也在場，雖然記憶力衰退，仍和來賓談天。不久，這兩項職務都由黃季陸先生接替。他們兩人正是早年復旦公學的同學，無論是公誼私交，黃先生對羅先生都能

^④ 例如「革命文獻」第九輯中刊載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大會之聲明文件（原件影印），即在一大大會檔案中提出。

照顧備至。

民國五十八年夏，羅先生病勢漸重，一度住入廣州街中心診所治療。漸愈後，又回天母休養。以後又住進石牌榮民總醫院。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便與世長辭。

在羅先生去世後，依照規定，臺北市潮州街的宿舍，仍可由羅夫人繼續長期的使用；儘管羅夫人有遷至市區居住的需要。她却和久芳女士清理了羅先生私人的東西，把羅先生的藏書和資料贈給黨史會，宿舍也退還給公家。這雖是小節，正是羅先生和夫人一向公私分明的地方。

羅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就長於寫作，故其著作至多，除印成專冊的有「科學與玄學」、「思想自由史」(譯著)、「近代獨幕名劇選」、「黑雲暴雨到明霞」、「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簡體字運動」、「心影遊蹤集」及「逝者如斯集」等書外，尙有其他多種著述散見於報章雜誌。羅先生的著作，不但是優美的文學，且具有高度的學術水準，應有專責機構(如黨史會或國史館)把它搜集起來，編印成羅先生的全集。此不僅為紀念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也有保存流傳供人欣賞研究的必要。

地闊相高本是國俗之陋習，有識者之居國也且恥言兩班，況以外藩土姓反凌中州之舊族乎！此一妄也。中州之紅帽蹄袖非獨漢人恥之，滿人亦恥之。然其禮俗文物四夷末當，顧無寸長可與頡伉中土，而獨以一撮之髻自賢於天下，此二妄也。昔月汀尹公根壽奉使於皇明，道逢御史汪道昆，屏息路左，瞻望行塵，猶以為榮。今函夏雖變而為胡，其天子之號未改也，則閣部大臣乃天子之公卿也，未必加尊於昔，而有貶於今也。奉使者自有見官之禮，而恥其公庭拜揖，輒圖寬免，便成規例。時有接遇，率以冗簡為致，恭謙為辱。彼雖不與苛責，安知不侮我之無禮乎。此三妄也。自知文字以來，莫不借讀於中州，談說歷代無非夢中占夢，乃以功令之餘習強作無致之詩文，忽謂中州不見文章。此四妄也。中州之人士，康熙以前，皆皇明之遺黎也，康熙以後，即清室之臣庶也，固將盡節本朝，尊奉法制，若造次談論，輸情外藩，是固當世之亂臣賊子也。然而一遇中州之士，見其誇張休澤，輒謂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嘆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此五妄也。^②

朴趾源就事論「是」，非獨斥其出使者之妄，實亦肯定清朝之地位。既肯定其地位文化，則從而學之而已，其他自不必顧慮。朴齊家之辯證分兩段。第一段採二分法，將滿清統治者與中國之人、中國之社會文化分離。說中國之學與滿人無關，乃由來所傳，即該國昔時所取法者。既如此，則自可學之。其「尊周論」道：

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以周之與夷必有分焉，則未聞以夷之滑夏而並與周之舊而攘之也。我國臣事明朝二百餘年，及壬辰之亂，社稷播遷、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驅倭奴而出之境。東民之一毛一髮罔非再造之恩。不幸而值天地崩斥之時，薙天下之髮而盡胡服焉。則士大夫之為春秋攘夷之論者磊磊相望，其遺風餘烈至今猶存者，可謂盛矣。然而清既有天下百餘年，其子女玉帛之所出，宮室舟車耕種之法，崔盧王謝士大夫之氏族自在也。冒其人而夷之，並其法而棄之，則大不可也。苟利於民，雖其法之出於夷，聖人將取之，而況中國之故哉。

「苟利於民，雖其法之出於夷，聖人將取之。」為其第二段辯證法。為富民強國，

^② 「熱河日記」「審勢編」，見「燕巖集」，卷十四，頁1。